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329天

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

329 Tage:Innenansichten der Einigung

〔德〕霍斯特·特尔切克/著
(Horst Teltschik)

欧阳魅/译
胡琨/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329天

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

329 Tage:Innenansichten der Einigung

〔德〕霍斯特·特尔切克/著
(Horst Teltschik)

欧阳甦/译
胡琨/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329 天: 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德)特尔切克(Teltschik, H.)著;
欧阳甦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6351-3

I. ①3… II. ①特… ②欧… III. ①德国问题-研究 IV. ①K5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8618号

·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

329 天

——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

著 者 / [德]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 Teltschik)

译 者 / 欧阳甦

审 校 / 胡 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 娟

特邀编辑 / 欧阳甦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97千字

版 次 /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351-3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3-1709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前 言	1
柏林墙开放 (1989. 11. 9 ~ 1989. 11. 20)	4
科尔的《十点纲领》(1989. 11. 21 ~ 1989. 12. 18)	26
崩溃前的民主德国 (1989. 12. 19 ~ 1990. 2. 9)	57
莫斯科的绿灯 (1990. 2. 10 ~ 1990. 2. 13)	92
棘手之处：北约、尼斯河与邻国 (1990. 2. 14 ~ 1990. 4. 26)	99
西方赞成统一 (1990. 4. 28 ~ 1990. 5. 10)	143
催化剂：贷款与协作 (1990. 5. 13 ~ 1990. 6. 22)	155
三大峰会的积极信号 (1990. 6. 25 ~ 1990. 7. 12)	192
莫斯科的奇迹 (1990. 7. 13 ~ 1990. 7. 19)	209
外交余波 (1990. 8. 13 ~ 1990. 10. 2)	231
人名索引 (以外文姓氏首字母为序)	252
译后记：并非“他人的生活”	263

前言

在 1989 年 11 月 28 日联邦议院的《十点纲领》演讲中，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提到了最重要的国际框架条件，它们是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的先决条件。但是，描写《十点纲领》产生以前的那段历史可能会超出本书的范围，另外，谁还想去考证那段历史实际上开始于何时？是随着 1985 年 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当选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 1983 年秋北约《双重决议》（NATO - Doppelbeschluss）的实施，甚至是 1970 年《东方条约》（Ostverträge）的签订？

因此，我决定从 1989 年 11 月 9 日写起，这一天是柏林墙开放的日子；止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统一之日。我当然知道，1990 年 11 月 9 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时才签署了各项德苏条约，1991 年春苏联最高苏维埃才批准这些条约；同样，1990 年 11 月 19 ~ 21 日，在巴黎举行了欧安会 35 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此时才在欧安会峰会的屋檐下圆满地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最后，还可以提到三周以后在罗马举行的欧共体峰会，它开启了有关政治联盟、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政府间会议。然而，从内容上看，在统一的当天，上述活动的结果就已经确定了。

因此，本书将集中于这 329 天，报告联邦总理府的日常工作，报告我作为总理府第二司——外交与安全政策司（主管外交和德意志内部关系发展政策、外部安全）负责人，是如何经历并参与策划组织这些工作的。其中心是联邦总理以及联邦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对统一进程的思考和决策。所以，本书并不会将联邦政府框架内的整体外交政策和德国政策都包罗进来。

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如外长汉斯 - 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总理府部长鲁道夫·塞特斯（Rudolf Seiters）、联邦财政部部长特奥多尔·魏格尔（Theodor Waigel）、联邦内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联邦国防部部长格哈尔德·施托滕贝格

(Gerhard Stoltenberg)、联邦经济部部长赫尔穆特·豪斯曼 (Helmut Haussmann)、联邦部长多罗特·魏姆斯 (Dorothee Wilms) 以及其他人物, 只有当与其直接打交道时, 他们才会出现在本书中。

同样, 联邦总理与外国政府首脑以及其他重要国际人物的大量会谈和会晤, 如果它们与德国统一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不属本书的关注范围。这段时间国内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和大量的两德会谈, 也同样如此。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除了联邦总理, 还有他这段时期的国际伙伴, 他们参与决策了统一进程的关键路线和进程: 乔治·布什 (George Bush) 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首相以及在关键时刻始终出现的人物——戈尔巴乔夫。

如今, 只有在政治剧变以后, 一些人才明白, 德国的成功统一恰恰是多么关键性地取决于戈尔巴乔夫这个人, 并最终让所有不断批评德国统一来得过快的人沉默不语。在那个短暂而幸运的时刻, 开启了德国统一的大门。

本书涉及的会晤、会谈、信件交换和声明, 都是我在联邦总理府工作时起草加工、分析评价和研究处理的。对于工作中杰出的合作与卓越团队精神, 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工作人员和同事, 首先是彼得·哈特曼 (Peter Hartmann)、乌韦·卡斯特纳 (Uwe Kaestner)、克里斯蒂安·于贝夏尔 (Christian Ueberschaer)、约阿希姆·比特里希 (Joachim Bitterlich)、特劳戈特·冯·罗伊卡特 (Traugott von Leuckart)、鲁道夫·朗格 (Rudolf Lange)、格哈尔德·维斯特迪肯贝格 (Gerhard Westdickenberg)、罗尔夫·尼克尔 (Rolf Nickel)、莱因哈特·施图特 (Reinhard Stuth)、米夏埃尔·路德维希斯 (Michael Ludwigs)、迪特尔·舒斯特 (Dieter Schuster)、德特勒夫·魏格尔 (Detlef Weigel)、赫尔曼·金茨 (Hermann Kinzy)、汉斯-洛塔尔·多姆罗泽 (Hans-Lothar Domröse), 以及我的秘书伊丽莎白·图恩斯梅耶 (Elisabeth Tünsmeier)、马里昂·施米茨 (Marion Schmitz) 和苏珊娜·娜科内齐 (Susanne Knetsch)。我还要特别感谢尤莉娅娜·韦伯 (Juliane Weber)、爱德华·阿克曼 (Eduard Ackermann)、沃尔特·诺伊尔 (Walter Neuer)、巴尔杜尔·瓦格纳 (Baldur Wagner)、诺伯特·普利尔 (Norbert Prill)、米夏埃尔·梅尔特斯 (Michael Mertes) 和约翰内斯·路德

维希 (Johannes Ludewig)。这是我们共同走过的道路，也是我们共同的成就。

我要将本书献给联邦总理科尔，他在一个历史性的瞬间，在正确的时刻，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我还要将本书献给我的夫人格尔西德 (Gerhild)，献给我的孩子理查德·亚历山大 (Richard Alexander) 和安雅·卡特琳娜 (Anya Katharina)，他们充满爱意和耐心地包容着我。

霍斯特·特尔切克

1991 年 8 月

柏林墙开放（1989.11.9 ~ 1989.11.20）

1989年11月9日，星期四

怀着复杂的心情，今天中午我们从波恩飞往华沙。民主德国的局势不断戏剧性地紧张，而偏偏此时联邦总理要到波兰进行他的首次官方访问，这显然使他在过去的几天里充满了不快。过境移民潮仍在急剧增长：昨天有来自民主德国的1.1万多人，本周末开始将有近5万人，今年则会超过20万人。移居人数的跨越式增长使我们所有人都想起了1961年夏天那些戏剧性的日子，在当年的逃亡潮结束之际，（两德之间）竖起了柏林墙。

这次访问计划五天——离开波恩的时间很长，但对于即将进行的华沙会谈将产生的重要意义而言，这段很长的时间则是恰当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次联邦总理的访问需要如此深入的准备，这些准备也进行得极其艰难。

在先后与波兰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与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和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进行了首轮政治会谈以后，我们在科尔下榻的迎宾馆集合，一起去参加官方晚宴。出发前，总理还想听听波恩方面的最新消息，就像每次出国访问时一样，在华沙也只有通过安装在总理套房中的特殊电话线路才能如此。

像往常一样，科尔的感受令人难以猜测，只有迅速的指示和越来越匆忙的活动显示着他的不安和紧张。他同样经历了此刻几乎无人能够相信而且瞬间就会使波兰会谈退居次要位置的事情：柏林墙倒塌。

总理与波恩的塞特斯联系，后者通报了目前已知的情况：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一份声明。人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份声明：从即刻起，所有

的民主德国人都可以去联邦德国旅行。科尔嘱托塞特斯和自己随时保持联系。此外，他还试图与统一社会党新任总书记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取得联系，总理想尽快与其会晤，同样，一旦民主德国选出了总理，也尽快与后者会晤。

总理套房中的气氛交织在希望和忧虑之间。希望在于，它是统一社会党终结的开始；忧虑则是，它可能导致前往联邦德国的大规模逃亡。我自己在高兴中也夹杂着担心，然而快乐的感觉还是占了上风。我想到了东柏林和民主德国的朋友们，对他们来说，现在确确实实地打开了通往自由的大门。

眼下没有时间深入思考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几分钟后，我们就到了原侯爵冯·拉迪泽维尔的宫殿，参加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向联邦总理致敬的晚宴。在我们进餐的大厅里，1970年12月签署了《华沙条约》，今年2~4月则在厅内的圆桌边举行了政府与反对派的会谈，它们铺平了波兰通向民主的道路。

欢迎酒会上只有一个话题，而我则回想起我们下午与瓦文萨的会谈：抵达华沙后，科尔马上先和马佐维耶茨基会面，后者看上去虚弱不安，会谈中一根接一根地点雪茄。之后，瓦文萨以及波兰下议院（Sejm）中团结工会的议会党团主席盖雷梅克立刻来到总理下榻的帕科娃迎宾馆。瓦文萨，原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电工，是一个外向的人，容易激动，声音很大，真诚而坦率。他的西服翻领上有一个很大的琴斯托霍瓦黑色圣母像^①，突出了他深深的、有时让人感到几乎是孩子气的虔诚。盖雷梅克则完全不同：内向，安静，差不多是从容不迫的，他浓密的胡须更加强了这一特点。

会谈中，瓦文萨——他的谈话方式是预言式的——几乎只集中于民主德国的局势。他担心，民主德国不可预见的事件会使波兰局势在联邦德国政府眼里退居次要，大家可以清楚地觉察到这一担心。他直接问总理，如果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总理将做些什么，难道不必竖起一道城墙？瓦文萨说，统一社会党无法贯彻改革，因为没有人再相信它，然而现在也没有另一个团体能够令人信服地引导并组织民主化进程，他看到的唯一道路是：开放柏林墙，允许有民主党派，宣布自由选举。瓦文萨还补充道，他

^① 琴斯托霍瓦（Tschienstochau）：波兰南部城市，位于瓦尔塔河流域，在历史上属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属波兰。琴斯托霍瓦黑色圣母代表着波兰之母和守护者。——译者注

非常吃惊，柏林墙竟然还立在那里，而最迟一两周后它就会被铲除。然后呢？民主德国的局势非常危险，他十分害怕发生革命式的骚乱。

科尔没能使他相信，无论民主德国发生什么事，都将保持波兰在德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意义。瓦文萨深深担忧，波兰可能再次沦为历史的牺牲品。

有些事情的确是事实：在德国国内时，对于是否能够通过这次访问彻底改善德波关系，我们所有人都半信半疑。在与波兰的关系方面，科尔始终视自己为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追随者，阿登纳在1949年的首次政府声明中就宣称，除了与法国、以色列和解以外，与波兰的和解也是德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1982年10月13日，科尔在当选为联邦总理后发表首次政府声明时，也与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强调自己拥护需要用生命去履行的《华沙条约》。由于1981年12月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宣布波兰实行战争法，双方关系暂时冻结。在开始今天的访问以前，我们克服了许多障碍；曾经有过误解，围绕重新确定奥德-尼斯河边界以及在安娜贝格山进行祷告活动的问题有过争执。在边界问题上，来这里之前，科尔局限于重申历届政府所坚持的法律立场。但是，只要能够解读尤其是愿意解读各种言论的人，都知道这位联邦总理并不怀疑奥德-尼斯河边界的永久性。他没有较为坚定地阐述这一点，只不过是出于政党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原因。他要避免奥德-尼斯河边界问题成为右派组织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话题，而且从一开始就要确保自己的波兰政策赢得绝大多数人的赞成。为此，他也需要“被驱逐者”的支持，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次旅行的准备阶段，波兰人就同意将关于生活在波兰的德国人的“文化认同”这一措辞放进共同声明中，借此，波兰方面首次正式承认了这些人的存在。

现在，这一切都退居次要。我们在拉迪泽维尔宫中品尝着鸡尾酒，同时，来自柏林的最新消息也在宴会中流传。每个人都试图了解民主德国领导层的决策细节。第一次冒出了联邦总理是否会中断访问的问题，但我们内部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对此，我本人会感到深深的遗憾：为这次华沙访问已经投入了太多，而在未来的德波关系中，又有太多的事情要取决于这次访问。

然而，我们还是被发生的事件席卷进去。在拉迪泽维尔宫中大厅举行国宴仪式时，在端上一道道菜肴期间，人们不断将我叫到等候在前厅的记

者面前，他们急切地等待着总理对柏林墙的开放表明态度。无人再对大厅里面正在发生什么，或者对科尔与马佐维耶茨基、瓦文萨在会谈中讨论了什么感兴趣。当我再次指出这次访问本身的意义时，收获的只有嘲讽的笑声。

官方晚宴后，联邦总理立刻前往记者们下榻的万豪酒店。他们对科尔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如何评估民主德国领导层作出的决定？他是否会终止对波兰的访问？总理显然努力保持镇静，主张在这个情绪激昂的时刻保持清醒并且冷静地思考以后的步骤。他强调自己要避免一切可能会导致波兰人留下如此印象的事情：因为民主德国的事件，现在他们的国家对我们来说变成了“第三位”。总理说，如果不是波兰和匈牙利借助其革命性的改革政策而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最终民主德国的变化也不会出现。

科尔补充说，晚宴时他就告诉马佐维耶茨基，考虑将访问“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先结束华沙的会谈，以后再完成华沙以外的访问项目，马佐维耶茨基没有反对这一想法。总理公开承认，面对波兰东道主，他处于“极其为难的境地”，他非常注意“不要伤害波兰人的感情”，然而眼下，很可能和许多记者一样，他的感觉则是“在错误的时间，坐在错误的地方”。

另一方面，总理也要避免由于操之过急的决策而发出“错误的信号”，从而进一步点燃人们的情感。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必须的话，我将采取不同寻常的手段全力应对这一局面。”总理解释道，现在东西方都在密切关注德国人是否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因此，要深思熟虑地作出反应并且注意语言用词。总理宣告：“现在正是书写世界历史的时刻。”他说，虽然没有人能够提到德国统一的时间，“但历史的车轮正在更快地运转”。

午夜，科尔让波恩的爱德华·阿克曼通过电话再次描述晚上发生的所有事件。估计在德国国内，此时大家都围坐在电视机前，而在华沙我们完全被切断了消息来源，甚至大使馆里也无法接收德国的电视画面。

我们再度考虑是否应该中断甚至终止华沙访问。总理犹豫不决，但原因只是这一步可能会在东道主那里产生负面影响。另外，我们也想起了阿登纳，1961年8月13日，在柏林墙竖起来的那一天，根据西方三大国的建议，他没有前往柏林，而是去奥格斯堡参加竞选活动。为此，许多德国人从来没有原谅他。今天，我们处于类似的局面吗？一些记者已经谈到了

相似之处。

鉴于有关柏林墙戏剧性事件的报道，科尔倾向于中断华沙的访问，明天返回德国，不过他还要考虑考虑，先睡过今晚再说。此时已是凌晨1点钟了。

1989年11月10日，星期五

在去联邦总理下榻的迎宾馆的路上，我碰到了瓦文萨，他和根舍外长约好7:15共进早餐。瓦文萨马上走到我面前，抓住我的手臂说，与他昨天预言过的相比，现在的一切发生的快得多；虽然他很高兴柏林墙倒塌，但也担心波兰将“为此付出代价”；在他看来，目前西德将政治和经济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民主德国。我的回答是想安抚他，但却是轻飘飘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他说得对。

当我走进迎宾馆时，科尔已经作出了决定：他要在下午4点结束华沙访问，5点飞回波恩；明天上午召开内阁特别会议；今天晚上，最晚明天上午就要与布什、密特朗、撒切尔夫人和戈尔巴乔夫通话。总理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与四大国非常详尽地协商，但这只能在波恩进行组织，华沙这里缺乏一切重要的通信手段。此外，无人能理解，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总理还不回到德国。

今天，在灰沉沉、雾蒙蒙的华沙，我们在无名战士纪念碑前开始了官方活动，然后前往英雄纪念碑，它使人想起了华沙阵亡者。最后，总理在犹太人纪念碑前敬献了第三个花圈，当我们保持敬献姿势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0年，他在这座纪念碑前下跪。人们怎么能够怀疑在此作出的这一姿态？

紧接着是总理与马佐维耶茨基的再次会晤，其后是代表团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当部长们签署11项政府协议时，有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柏林市长瓦尔特·蒙佩尔（Walter Momper）呼吁在柏林舍内贝格区政府前举行群众集会，集会将在下午举行，联邦总理也将参加。

科尔非常激动不安，他对此一无所知。蒙佩尔宣布这次活动开始的时间是下午4点半，但没有与联邦总理或者哪怕只是与波恩的“看守人员”商议过。这不仅是不同寻常的行为，我们还怀疑蒙佩尔是故意将群众集会安排在这么早的时间，如此一来，即使科尔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及时赶到

柏林，对总理来说，这在公众中留下的印象将是灾难性的，而我们相信蒙佩尔在耍阴谋诡计。

科尔清楚，他现在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及时赶到柏林，虽然这根本就不是他的本意。因此，无论如何都无法举行原定在下午 1:45 与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的会谈。当科尔请求马佐维耶茨基和他一起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的时候，已将近 12 点钟了。总理的办公室与总统有直线电话，主席亲自拨打电话并解释说，他和总统每天多次通话，有着良好的关系。他用很低的、近乎谦卑的声音和雅鲁泽尔斯基说话，后者表示理解联邦总理的处境并同意推迟会谈时间；不过，他很重视会谈按计划的那样，详细地交换意见，会晤也不应只是礼节性的访问。

联邦国防军的总理专机不能直接飞抵柏林，这加重了我们返航的难度。在美国大使维侬·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的帮助下，我们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汉堡转乘美国军用飞机。起飞前，科尔还去了华沙市的北墓地，这是第一次，一位德国联邦总理能够在波兰探访死于“二战”的德国士兵墓地。

下午 2 点半，飞往汉堡。现在，柏林的群众集会安排在 5 点。飞行途中，我为总理写了一份演讲稿。在汉堡，我们转乘美国空军的小型飞机，飞机上只有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人员。大家内心非常紧张，人人都在沉思，几乎一言不发。联邦总理坐在我对面，处理自己的演讲稿。

在滕珀尔霍夫机场，联邦政府驻柏林的特派员君特·施特拉斯迈耶（Günter Straßmeir）正在等候我们。关于群众集会及其策划过程，他并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报告的细节。联邦总理愤怒不屑的眼光射向了他。

4 点半，当我们的汽车到达舍内贝格区政府前的时候，这里聚集了最多三五千。他们用尖锐刺耳的口哨嘘声迎接科尔。从外表上看，科尔仍是平静的，没有表现出激动，我却非常吃惊，一时失控地对联邦总理说：“就因为这些人，我们才中断了华沙的访问？”柏林众议院议长于尔根·沃尔拉贝（Jürgen Wohlrabe）来迎接科尔，此时科尔才知道，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也号召在纪念教堂前举行群众集会。在联邦总理的盛怒中，沃尔拉贝解释说此事已无法更改，因此科尔接着还必须去那里演讲。总理勃然大怒，并断言，此时的柏林基民盟所有负责人都是“无能之辈”。

群众集会开始之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无法辨认参加者的人数，估计有 2 万 ~ 5 万人。蒙佩尔、勃兰特、根舍、科尔和沃尔拉贝站在一个小

的木头讲台上，紧紧围着麦克风，夹在大量的安全人员和其他政治“要人”中间。

蒙佩尔说“德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但他称东、西德国人的这次相遇并非“重新统一的日子”，而是“重新相见的日子”。然而，实际上，正是这座城市两部分的柏林人，在过去的一晚，已经事实上进行了几个小时的统一。

1961年8月13日就担任过柏林市长的勃兰特，对于昨晚的事件有着更敏锐的直觉。他认为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违背常理的德国分裂将无法存在”。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勃兰特说，“我们正处在这种形势之中：本属一体的东西必将长在一起”，在听众的欢呼声中，他还补充道：“柏林将长存，而柏林墙将倒塌。”

在勃兰特讲话时，我被突然叫走去听电话，电话的那头是苏联驻波恩大使尤里·克维钦斯基（Julij Kwizinskij）。他有戈尔巴乔夫给联邦总理的紧急消息，并请求我绝对要在群众集会时就将这则消息转告给科尔。克维钦斯基说，众所周知，现在柏林的两边正在举行群众集会，而在目前的窘境下，无论如何都要避免“骚乱”，因此戈尔巴乔夫总统请求联邦总理安抚大众。没有时间进一步询问，我必须回到总理身边，挤过厚厚的人堆，向他转告戈尔巴乔夫的消息。总理得知了这一消息，但未做评论。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估计戈尔巴乔夫担心，在两次群众集会上民众的情感会受到煽动，以至于像头一天晚上那样，越过城墙而聚集在一起，“脚踏实地”地贯彻统一。政治家们将因此失去对事件的控制，并且很快就会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戈尔巴乔夫似乎是凭直觉就觉察到，与眼前再次相见所带来的亢奋相比，德国两边的民众内心有着更大的波澜。戈尔巴乔夫的消息是否不仅是出于担忧的请求，而且也是隐藏的警告？眼下，我们无法讨论这一点。

在演讲中，根舍极力避免任何与统一主题相似的内容。在所有的演讲中，他的讲话是唯一试图告诉邻国和世界，将来他们也不必害怕德国人。

当联邦总理走到麦克风前的时候，再次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哨嘘声，而且整个演讲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科尔经历了无数次选举集会的磨炼，他坚持完成了这次演讲。有一次蒙佩尔试图打断他，以便对那些干扰者施加影响，但总理没好气地把他推到一边。总理突如其来地呼吁：“保持镇静并明智地行动”，正如民主德国市民们做过的那样。“现在，明智的

行动就是不要追随极端主义的口号和声音”，目前要“从容不迫地一步步找到迈向未来的共同道路”。他是唯一表示感谢的演讲者，感谢“我们的美国、英国和法国朋友的支持和团结，过去几十年来，这一团结是拥有自由的那部分柏林能够自由存在的保证”，他也向戈尔巴乔夫总统表达了“敬意”。

“另一半柏林”聚集在纪念教堂前。将近6点半，我们到达纪念教堂，此时大约有10万~20万柏林人拥到这里。只看到零星的干扰者，这次迎接科尔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当他再次离开演讲台时，人们差点把他挤倒，其中许多人来自东边，他们是第一次直接见到总理，一定要碰碰他。

最终，科尔指示自己的司机脱离柏林警卫队而驶往查理检查站。我们在检查站前面3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继续步行。从东柏林过来的大量人群和一个特拉比车队向我们涌来，转眼之间就把我和联邦总理分开。几乎看不到他本人，而“赫尔穆特，赫尔穆特”的呼叫声则响彻天际，人们向他伸出手臂，流下了眼泪。显然，被人群团团包围给总理带来了力量。当我们再次坐进汽车时，他对我说：“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8点钟，乘坐美国军用飞机返回波恩。飞行途中也没有时间喘口气，总有新的消息传来。此时与我们会合的塞特斯报告了朔伊布勒和他本人与民主德国国务秘书亚历山大·沙尔克-哥罗德科夫斯基（Alexander Schalck-Golodkowski）的通话，其中谈到了旅行法和民主德国领导层对联邦德国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期待。此外，沙尔克还提议统一社会党新任总书记克伦茨与科尔举行会晤。

明天，总理先要与克伦茨通话，只有组建了民主德国新政府并且明确商定了议事日程，科尔才会与他会晤。因此，塞特斯将在下周去东柏林进行预备性会谈。

从机场急速驶进总理府。已通知10点钟要和撒切尔夫人通话。她今天在唐宁街10号前的媒体谈话中说：“这是自由的伟大一日。现在柏林墙也必须倒塌。”通话时，在谈到柏林事件以前，总理首先请求首相支持波兰。撒切尔夫人让科尔说明他下一步要采取哪些行动，并且提议在欧洲理事会下一次会议以前就举行为期半天的12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峰会，因为现在绝对有必要进行紧密的沟通和直接的思想交换。对她来说，了解联邦总理是否计划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翻译留在房间里，因为几分钟以后科尔就要和华盛顿的布什通话。对于科尔希望能够援助波兰的愿望，美国总统也几乎没有兴趣，他主要想知道科尔对柏林情况发展的评估。科尔对布什强调民主德国民众的行为是何等深思熟虑，并认为现在的关键是民主德国领导层是否准备进行根本的改革。布什表达了他对联邦德国政府处理这一局势的最高敬意。最后他谈到了自己即将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说这一会晤现在变得“非常重要”。

将近 11 点，联邦总理还将塞特斯、朔伊布勒、魏格尔、魏姆斯、约尼·克莱因（Johnny Klein）和我召集起来，最后商量局势。这一天漫长而紧张，所有的人都筋疲力尽，好像粘在椅子上，无法动弹。朔伊布勒报告说，移居人数今天明显回落，他对能够安置所有来的人感到乐观，并认为“我们要比民主德国更容易应对此事”。在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移居者仍将得到充满好感，甚至是有些激动的接纳。然而，由于住房短缺，如果移居人数再度上升，则会出现急遽的情绪变化。很久以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德国人的牺牲精神。

与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所有会谈都在东柏林举行，大家认为局势非常棘手，需要紧急援助，以稳定形势。我们一致认为，所有的援助首先都必须有利于民主德国民众，因此经济领域内的任何有意义的合作，都要以民主德国的改革为前提条件，眼下大家很可能只能帮助克服供应瓶颈并确保提供医疗关怀。

讨论过程中，我被叫去听电话。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这位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将今天下午我们在舍内贝格区政府前的群众集会中得到的口头消息告诉了布什。斯考克罗夫特说，戈尔巴乔夫称柏林的局势“极为棘手”，他指示自己的东柏林大使与三大国大使联系。

没有进一步评论这条消息。联邦内阁昨天——在我们飞往华沙以前——才获悉并同意总理的声明：他拒绝四大国之间以任何一种绕过德国人的方式进行沟通。

最有意思的消息是这条秘密通知：戈尔巴乔夫敦促统一社会党最高层确保民主德国的“和平过渡”。这确认了我们的评估，即无论如何苏联方面都没有想过采取压制的解决办法，从一开始起，联邦总理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与戈尔巴乔夫的大量谈话中，他赢得了这一保证。不会再次出

现6月17日^①。现在，戈尔巴乔夫也让人将这一消息转告给布什，请求大家共同关注，不要在政治上失去对事件的控制。

不过，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印象：新的民主德国领导层再度黔驴技穷，并绝望地等待联邦政府的快速援助。总理也要保持自己既克制、原则又坚定的路线，整整一年他都在维护德国政策中的这条路线。至少从夏季匈牙利边境开放以来，民主德国的发展成了德国政治的主导话题。三天以前，科尔还在联邦议院再次大力强调过，只要民主德国领导层明确承诺进行真正的自由选举，取消其宪法中确定的统一社会党的权利垄断并允许成立独立的政党，那么他就准备提供“全面的援助”。过去几个月以来，他始终避免火上浇油，不过也很重视避免出现对德国内部事务的各种外部干涉。

在途经匈牙利的逃亡潮期间、在9月份几千人通过我们驻东欧国家大使馆的花园而寻求自由之路的时候，联邦政府就避免任何装腔作势的表演，我们在舞台的背后展开着忙碌的谈判，以便帮助这些人。在东柏林，在民主德国将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仪式时，以及几天前在德累斯顿载有从布拉格大使馆前往联邦德国的逃亡者的火车遭到暴力干涉时，再次唤起了最严重的担忧，柏林墙也是在驻东欧大使馆花园出现的那些场景所产生的印象中倒塌的。然而，今天晚上，并没有人谈到再次统一，在过去的几天和几周里，我们很有可能都有过这一想法，但在忙碌的日常工作中，却没有人敢于盼望柏林墙这么快倒塌。现在，开始结束分裂了吗？

自从11月4日将近100万人聚集在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举行和平示威并要求改革以来，对每个人来说，情况都很显然，那就是民主德国领导层再也无法控制局面。现在，在晚上的谈话中，没有人真正相信继承了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衣钵的克伦茨能够解决问题。总理完全不信任他，并拒绝立刻与他会晤。作为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克伦茨要为5月份地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负责；作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他也得到授权可以对国家安全部，即“斯塔西”（Stasi）发出指示。至少到目前为止，克伦茨始终明确地声明，对他来说，在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上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而且民主德国必须仍是一个主权国家。任何人都不认为克伦茨是才能卓越的人，而且只有少数几个人认

① 1953年6月17日，民主德国的抗议活动，后遭到苏联和民主德国军队的压制。——译者注